



# 凡尔赛 的幽灵

凡尔赛会议宣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会后，各国便转而关注国内问题。这与如今的全球现状有着相似之处

巴里·埃森格林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 (Georges Clemenceau)、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以及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 (David Lloyd George) 在签署《凡尔赛条约》后合影。



图片：GETTY IMAGES / PHOTON-DEUTSCH COLLECTION / ISTOCK / MALIJA

一百年前，1919年6月29日，《凡尔赛条约》正式签订，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鉴于这个条约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百年纪念日无法成为庆祝的理由。这个条约并未实现持久的和平，也未在欧洲或全世界开启一个繁荣时代，未在国际经济及政治管理的治理方面建立起有效的制度框架。

的确，鉴于该条约的彻底失败，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采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求美国发挥更强大的领导作用，同时也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内构建起全面的制度。在1950年之后的25年中，工业化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发展。

但人们渐渐淡忘了这些往事。要说我们正在重复《凡尔赛条约》的错误，其实并不为过。当时，美国是合约谈判中的参与方，但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谈判的结果不承担责任。美国拒绝加入国际联盟。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意在强化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但美国并非该会议的积极参与方。美国并未支持国际联盟为关税休战而开展的谈判，并于1923年和1930年挑衅性地提高了进口关税。美国并未免除其欧洲盟友欠下的战争债，从而使德国的战争赔偿问题更加棘手。

## 避免受到牵连

这种转向国内问题的做法再次证明了美国政治思想中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可追溯到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于1776年发表的那部极富影响力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这部作品反对纠缠不清的联盟。美国与欧洲相隔2000多英里的大洋，这使得美国领导人认为他们可以对欧洲大陆的事务置身事外。只是在德国潜艇攻击美国船只，使得美国长期奉行的中立政策难以为继后，美国才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美国为了避免受到牵连，不仅制定了全新的关税，而且出台了限制性的移民法。

毫无疑问，这与美国当前关注国内利益的关税及移民政策并无二致。

类似的情况还包括那些催生美国独立主义倾向的因素。像21世纪初一样，20世纪20年代是

经济迅猛变化的时期，对于那些感到自己被抛弃的人来说，他们往往会怪罪外国人，敦促政府通过关税来解决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这意味着美国农民，尤其是谷农要面对阿根廷、加拿大和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种植面积扩大后带来的收入减少。1930年颁布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起先被视为一种有效措施，可保护美国农民不会因廉价的进口商品而遭受损失。可现实是，造成农场交货价格偏低的因素与其说是进口商品带来的竞争，不如说是拖拉机。但与逆转技术进步相比，指责外国人要容易些。

如今，令人焦虑不安的是不断下滑的制造业就业情况，而非农业的就业情况。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是机器人技术，而不是发动机驱动的农用机械。但政治反应对此却没什么不同。

## 移民配额

像现在一样，当时的美国在转向孤立主义时也存在一种身份政治的思想。那些来自英伦三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早期移民通常是新教徒，面对来自欧洲南部和东部各国的、有着浓厚天主教思想的移民，他们深感不安。1921年，对两位意大利出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尼古拉·萨科(Nicola Sacco)和巴托洛米奥·范泽蒂(Bartolomeo Vanzetti)的谋杀罪进行的审判和定罪轰动一时。这件事颇具象征意味，代表了美国对那些所谓的新移民持有的怀疑态度。根据1924年《移民法》的规定，决定移民配额的不是当前的人口份额，而是此次新移民潮之前的1890年各个移民团体的份额，这很能说明问题。在经济困难时期，美国人对那些讲另一种语言、信奉另一种宗教、肤色更深的移民怀有的敌意更加强烈，尤其是在1929年至1936年的墨西哥裔人口遣返计划期间。当时，多达200万墨西哥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被遣送回国。

因此，孤立主义倾向一直存在于美国政体之内，在经济混乱和身份问题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这种倾向变得极其强大。20世纪20年代和如今的情况便是很好的例子。

凡尔赛的另一个根本错误便是剥夺了那些崛起的大国在国际组织内的一席之地。直到1926年，



1919年，各国代表参加巴黎和会的开幕式。

## 要说我们正在重复《凡尔赛条约》的错误，其实并不为过。

德国才获准加入国际联盟。德国的军事面临永久性限制，其经济自主权也受到限制，尤其是禁止其与奥地利建立关税同盟。这些强加于德国的苛刻要求助长了毁灭性的民族主义，并最终导致魏玛共和国的崩溃。

### 独自和解

1918年，实力受到削弱的俄国与德国达成独自和解。尽管反布尔什维克俄国省议会代表们参加了凡尔赛和谈，但布尔什维克们却没能参加会议。因此，在苏联于1922年成立时，并没有资格参与国际制度的重建。1934年，全新的苏联最终加入国际联盟，但这只是临时性的。到这时，苏联一直被排除在西方经济和金融体系之外，从而为世界经济，乃至整个世界分化成苏联阵营和西方阵营创造了条件。

如今，中国正积极努力在全球舞台上站稳脚

跟。问题是，中国是要通过现有的多边体系（如IMF和世界银行）还是要通过中国自身设计的方式（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来发挥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如果中国通过IMF和世界银行进行投资并提供经济资助，那么中国将面临现有的制度约束，而且中国的影响会被其他成员国所抵消。如果不这样做，那么中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更自由地行动。美国和其他国家不愿中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这便加剧了最后这种危险。

《凡尔赛条约》的失败让人们意识到，大国在建立并维护那些起稳定作用的联盟和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也让人们意识到有必要将新兴大国建设性地纳入到这些安排之中。但美国此刻似乎忘记了这些教训。美国政界以前曾出现过孤立主义倾向。问题是，这种遗忘是暂时的，还是持久的。FD

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他近期出版了《民粹主义的诱惑：现代的经济衰退和政治反应》（The Populist Temptation: Economic Grievance and Political Reaction in the Modern Era）一书。